

北海文史

第十一辑

民俗·方言

北海居民种族溯源

北海半岛在史前已是中华民族食毛践土的地方。夏、商、周三代以前，这里先后曾是西瓯和骆越民族的分布区之一。秦汉以后，是上述越(粤)人支系的“乌浒蛮”族人所居，为“俚(僚)”族的祖先。“俚(僚)”族人有部分后来逐渐与汉民族融合，成为合浦(含北海)的土著居民。其中因谋生手段的不同和与汉族融合的先后，又分别有不同的称谓。这就是“蜑民”、“俚人”、“东人”和“客民”。

“蜑民”是“舟居穴处，亦能汉音，以采海为生”的水上居民，其远祖当系秦朝统一中国时，“莫肯为秦民”而以海上作为庇护所的越人。俚人，“深居远村，不解汉语、惟耕垦为活”，是合浦腹地农村山区的主要居民之一；“东人”散居于山区或沿海，“解汉语，业耕种”，是北海半岛稍晚于“蜑民”，却早于其他的居民。现今冠头岭下村和沙湾、红坎、独树根等农村一带的村民，是说闽南话的，他们是“东民”的后裔。“客民”则是后来增加的“居城郭，解汉音，业商贾”的外来户。这些在唐、宋以后史籍上合称为合浦(含北海)的“四民”，不管他们来自福建、粤东沿海或两广内地，追根溯源，大抵属古越(粤)民的后裔。在“俚人”之中，又有一部分因迁徙、改业而成为现今合浦沿海唯一保存“俚”族系遗音的所谓“仡人”。其后裔是现今居住在北海龙潭以东的西村至白龙、营盘一带，从事半农半海的村民。他们说的是一种音调低沉，多带鼻音的“仡话”，市区居民中亦有不少说“仡话”的。这种仡话是比廉州话还早的合浦方言。

十八世纪后期，由于北海口岸开放和内地军阀混战，前来北海经商或逃避兵灾的人很多，城乡居民的里贯和语言日渐繁杂，其中以来自广东沿海和广西内地的为多，北海现今流行的“客话”，正是广州语系与本地的廉州土语相结合的产物。

(《北海日报》1984年10月1日创刊号)

“疍家”今昔谈

“疍家”又称“疍户”，这是封建时代对沿海船民的侮称。关于“疍家”是不是个种族？历来曾有争议，说是种族，但“其种不可考”；说不是吧，但其服饰风俗却自有一套。我们认为，后一种看法是片面的。因为他们的服饰风俗的自成特点，是长年累月以船为家，从事渔业的特殊职业决定的，故算是个职业群体，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称之为“家”而不称为“族”的原因。

据《广东通志》，我国沿海“疍户”“以舟为家，捕鱼为业。晋(朝)时不宾服者五万余户”，以此推知，这个浮家泛宅，靠海为生的群体，至少在我国造船技术已达到相当高水平的秦汉时代就逐渐形成了的。因为在晋朝时他们中不承认司马氏中央政权的，已经有五万余户之多，可见当时他们的人口是相当蕃衍的了。故此便被“目为疍家”，这就是对他们侮辱性贬称的由来。到了唐代，才设户口登记和“计丁授粮”，是正式纳入行政管理和由政府供应粮食的开始。明朝洪武初年又设置“里长”基层行政来加强管理并征收渔税。

广东的“疍家”，历史上多集中在潮汕、新会、增城各县海边，雷、琼较少，廉州(合浦)尤少。北海的“疍家”历史较晚，约在清康、乾年间才从广东的新会、雷州的江洪一带迁移来外沙定居的(也有从合浦沿海渔村移来的，祖籍均同，这从他们的语言多带江门或者江洪土音可证)。

“疍家”在封建社会里深受歧视压迫，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他們看作是“愚蠢不谙文字，不记岁年”的蛮民。他们没有在陆上定居和与陆上居民通婚的自由，只能过着“终岁局促舟中，所得仅充一饱”的非人生活。清朝雍正年间，沿海“疍家”虽与陕西乐籍、江浙惰民一起获得皇帝“恩赦”，废除了传统上某些对之过分压制的政策，但终因封建制度下顽固的意识观念所决定，他们卑下受压的社会地位和处境，直到解放前夕仍没有多大改变。

说到合浦的船民，历史上的命运则更悲惨，是因为合浦是著名的珍珠产地，历代封建帝皇都不惜用船民的血肉来换取他们心爱的珠宝；特别是明朝正德、万历两朝，派来合浦白龙坐镇采珍珠的“珠池太监”，暴虐贪婪，被迫冒险出海的船民“死者万计，得珠仅百八十两”造成“以人易珠”的惨剧。船民联合陆上居民一起造反的事件层出不穷，使合浦一带经常出现“四山戎马夜纷纷”的混乱局面。迫使明朝不得不数度撤回采珠成命。所以合浦沿海的船民是富有斗争传统的。

北海外沙的船民，与土著的地角、咸田渔民的风俗习惯语言均有区别，他们列棚而居，多事渔业，也有搞运输和驳艇的，他们从前的衣着一般偏短，是亚热带气候和便于海上操作之故吧。婚嫁习俗有别于市民的是，新娘出嫁前十天的“哭嫁”（俗称“哭家姊”），简直就是歌谣演唱，有母女对“哭”，有伴嫁妹对“哭”，实际是以歌代哭的对唱，十分哀婉动听，出阁前夕的“拜凡”（膜拜下凡仙姬之意），女客麇集，个个炫服金饰，人手折扇，轮番双拜仙姬毕，就是讲古说文，唱歌对答，闹至深夜始散。出阁之日，夫家准于预订的吉时派代表（新郎不亲自来）以小艇来接新娘，在伴嫁娘张伞簇拥之下，和装奁一起分乘小艇送嫁，此时沿路笑语和以桨声，海港气氛为变。夫家当晚的“伴郎”仪式，又是一番说唱的逞艺场所，此种风俗，似属《通志》所载的“男女衣不盖肤”和“婚时以蛮歌相迎”的遗风吧。

解放后，北海市外沙船民与全国各地船民一样，才算彻底翻身，他们已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，他们有出席全国的和区、市的人民代表，有出席全国、全区和市内的先进生产者。传统的风俗习惯已日渐改变，与陆民已毫无二致了。

（《八桂香屑录》1992年3月）

“疍家”的衣食住习俗

北海“疍家”的衣食住风俗特点，亦与陆民有明显区别。

衣着方面，上衣多短身窄袖，男裤偏短，女裤多宽。是为适应亚热带气温和船上操作之故。史书说“疍民衣不盖肤”是有所指的。“疍家”妇女头包更为特别，多用红黄两色间格布夹层浆硬，正方斜角突出额上，状似猪嘴巴，故疍家人称头包为“猪嘴”，发髻多簪珥饰物，光耀夺目。此种装扮，至今仅见于广东珠海渔民和北海侨港镇船民了。

“疍家”住处“两栖”。有全家大小和禽畜一起随船出海以“舟楫为家”的传统，但也有固定于海边“植木构成”的棚户，这是远海归来休整的基地了。住棚虽狭，但每天洗刷，洁净无尘，习惯了“终年局促舟中”的生活，倒觉安适。

论食，“疍家”食谱比陆民丰富得多。海鲜海珍，“皇帝也让我们先吃”，这是疍家人的豪语。特别的食法是，鲜鱼鲜虾入酒曲糯米同腌，称为“糟鱼”“糟虾”，香甘鲜美异常，这是陆民无法享受到的。

食饭禁忌甚多：筷子不能搁在碗上，因为这是“搁浅”的兆头。食具不能覆

置，因为这意味“翻覆”。生活用语也忌说“翻”“逆”“慢”“沉”与及“合家产”等字词。爱用稳、顺、快、利和全家福等字词代替。这点，地角渔民也是常用的。

(《八桂香屑录》1999年3月)

理发业旧行规

俗话说：“险过剃头”。理发择善而从，绝非把返还老童寄望于“顶上顶夫”，而是免使自己头颅横遭刨削；那怕仅仅二十分钟折腾也罢。所以我是理发老师傅工作椅上的常客。

旧社会被摈斥于“九流”外的剃头匠是怎么“捞世界”？我向老师傅请教。

“旧时干这行，先要搬钱拜师入行，然后靠手艺过硬。学剃头要三年出师，头一二年干杂役，最后一年才让抓刀剪。师傅兼老板只管饭不付酬，年终赏一套‘大成兰’衫裤了事。学艺期满只得师傅一句话：‘你出师了’。凭这四字才可自立炉灶，算是‘入行’了。”

我问如果自学不从师呢？老师傅感慨地追述他的经历：“我是不从师而被同行赶出家乡来北海的。”他回顾能在北海落脚，是因为他设法弄到一本“天书”作护身宝才免遭厄运。

开档第一天，前来“踩馆”的人气势汹汹发问“你从哪里来？”接着象连珠炮般的轰击：“刀有几只眼？椅有几条腿？拜什么为师？”老师傅逐一回答：“从日出的方向来。刀有四只眼。椅有六条腿。拜水石为师。”来人即与他称兄道弟起来，便算入了北海的“行籍”。如果应对不上，就肯定被踩馆，得漏夜检衫包行身。

老师傅能在北海扎稳脚，不能说不得益于这本“天书”，所谓“天书”，实即剃头技艺秘传和行规暗语的集成，书中不但详载有所谓“八仙过海”“五马巡城”、“双凤朝阳”、“八仙骑鹤”等“三十六刀半”的刀法套路，用刀先后顺逆轻重宜忌都有讲究。还有醉后和夜晚以及喉咙险处不剃等为顾客安全设想的戒条，都很可贵。老师傅都一一在头面上作了表演，使我增识不浅。凭他多年操业领会的祖师真传，不外是“谨小慎微纤毫不苟”八个字。

(《北海日报》1988年9月6日)

北海牛墟交易习俗

北海市有“市”无“墟”。但高德牛墟却是例外。牛墟起自何年？不必也无从

深究，但可以说，它与北海农村同起始是可信的。

牛墟交易有一套特殊例规。专门以介绍买卖耕牛为业的捐客，俗称牛客，穿梭于牛墟人牛之间，手持一根竹杖，招徕游说，买客与他接头时，便在竹杖上端指指点点，双方不发一言，卖牛的并不插手和插嘴，如置身事外。成交后，卖主才与买主直接发生牛款交接关系。捐客则收一定介绍费。

原来牛客的这根竹杖是赶牛兼议价的工具。竹杖的上端，刻着九个数码，每三个数码一行共三行，第一行是 438；第二行是 951；第三行是 276。各行数码，横直相加都等于十五。议价时，双方各在竹杖数码上指点以代言。例如卖方讨价 890 元，则指 8、9；还价 700 元，则指 7。之所以这样做，可能是为了信息保密，不让第三者插手干扰之故吧？这根竹杖的专用数码表，还有一首歌诀，是旧农村学塾为培养学童的实用知识的必修课，歌诀是：

四海三山八洞天，九龙五虎一齐眠。

二郎七夕六儿女，周围十五月团圆。

歌诀的第一、二、三句分别指第一、第二、第三行的数码。第四句说的是三行数纵横相加都等于十五。现在高德牛墟已不存在，合浦乌家牛墟还继续传统的交易活动，但不知竹杖议阶的老例规还保留否？

(《北海日报》1994 年 11 月 12 日)

北海为何有“市”无“墟”

查阅方志典籍，北海市政区 275 平方公里半岛范围内，“市”的名称最早见于乾隆版的《廉州府志》中的“高德市”和“乾体市”。而“北海市”一名，在同治年间成书的《广东图志》中才出现。考高德、乾体和北海三“市”的历史，都没有三日一墟的传统习俗(只有高德的牛墟例外)，天天都成集市。

墟、市的活动，可以说是与人类社会进入私有制时同步出现的。《易经·卜系辞》中已有“日中为市，致天下之民，聚天下之货”的记载，是聚集商货交易的场所，所以北方有“市集”之称。墟是间歇性的集市，市是经常性的集市，墟、市以此为别。墟的集期称“墟期”，非墟期时市集空虚。这是墟字所由来。

合浦地方墟期为三日一墟集，各墟之间错开而不雷同，各有逢一四七日、二五八日和三六九日(以农历为准)成墟的，相沿成习，从不改变和间断。赶墟期买卖谓之“趁墟”。柳宗元诗：“青箬裹盐归垌客；绿荷包饭趁墟人。”说的是壮族

地区。清代诗人有句：“墟余常乐人争趁，”“三日一墟人不断。”说的是合浦地区，可见趁墟（北方称赶集）是源远流长的人民经济生活中重要的活动。墟有专业性与综合性之分，专业性的有种苗墟、粮食墟（俗叫谷米墟）、猪墟、牛墟等等。如高德的牛墟、福成的猪墟都很出名。以综合性的墟为普遍。

说到正题，北海地区为何有“市”无“墟”？得从北海半岛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的历史去找答案：

其一，北海半岛纵横距离不超过 30 公里，属交通相对便利的平原。古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口并不密集，自然经济以渔业为主（含采珠业），农业为次。交换物资多属日常生活必需品中不能久贮的食品如蔬菜、鱼蛤之类。故无必要三日一墟。

其二，渔业历来是北海地区的经济基础。收获期受潮水和季节决定，不象农业收获有固定性。海产品的商品价值取决于新鲜，随获随供，买卖无时间规律，不能受墟期限制。

其三，海运业是北海仅次于渔业的经济行业。在明朝中后期，北海港与越南之间已有定期货船交通。内地外运商品的集散，亦须迁就潮水的涨落。非间歇性的墟期所能适应。

答案仅属一家之言，未敢诩为定论。顺便要说明的是，本文所说的“市”并不与现代城市都市概念等同，是与墟相对而言的。

（《北海日报》1994 年 12 月 2 日）

爱惜字纸

笔者在启蒙入塾的少年时代，紧记母亲的一条教训——爱惜字纸：不得用写有或印有文字的纸张揩屁股；路上地下见到字纸要检拾烧掉，不得任人践踏……不然，据说“孔夫子责怪，将永世认不得字，成为‘盲佬’！”私塾先生也有“不得随地扔字纸”的训导，但没有象母亲那样说明违犯教条的“后果”。因此，我和很多同学都养成了爱惜字纸的习惯。

当时有位老者，身穿背上印有“爱惜字纸，功德无量”字样的上衣，肩挑一对大竹筐，手持一把长柄铁夹，沿街检拾有字的纸屑，筐满则送到普渡震官右侧一座烧纸塔内焚化，这位专门拾纸人属于“五保户”一类的人物，每月领有由慈善团体“普善堂”发放的救济金。抗战后，普善堂经费断绝，由警察局专管环境

卫生的“垃圾头”适当给予买米钱，使此“专业”赖以维持一段时期。

带有迷信色彩的家教不宜提倡，但爱惜字纸的指导思想是尊重文化和知识，且有利于环境卫生，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受时代局限的美德吧。

(《北海晚报》1996年8月6日)

廉州话词、字构成的特点与根源

廉州话是合浦诸种方言中的代表语种，流行区有合浦、浦北、北海以及钦州、防城、灵山、博白等市县中的一些乡镇。流行人口约120万人。因其特殊方音和词汇，限制了它的流行范围。在廉州话的丰富词汇中，却保留着大量中土文明的痕迹，有古秦汉的字音和江浙、两湖、闽粤等地的方言词。故可以说廉州话绝大部分语字，是古汉字音义的沿袭，非完全出于杜撰。廉州话有些单音词是二字词语连续的切音；有的词是古今语音的演绎；有的字是方言音义的假借。因此，用文字来表达廉州话，会有不少是古汉字的僻体字或异体字，当然亦有不少土俗字是根据“六书”中的会意、形声而杜撰的，另外，还有许多字词只存其音，未有其字的。这些特点，构成了廉州话长期被误解为“不论其字，惟取其音”的片面概念。

因为铅字和电脑字盘缺略，排版困难，不打算在此举例说明。为什么廉州话跟两广各地一样，土俗字特别的多？因为岭南古属“百越”地区，民族派系丛杂，方音杂沓，无本族文字。秦始皇“略定扬越”，移民南下，中土文化南输；两汉时期，合浦珍珠贸易与番禺海外“贸迁”发达，北方文明亦不断随南来商贾传入。原来十分丛杂众多的方言虽然未形成一种统一的岭南语，但却增加了不少中夏文明的词汇和语音了。随着物质文明和生活内容的日益丰富，汉字汉音已显得不敷使用了。因而各地方言中的特定文字，便根据各地不同方言音义的需要，扩大汉字使用范围并赋予新的字义，不足部分，则由历代众手杜撰；“绵历岁月，约定俗成”的土俗字来补充。这就是廉州话与岭南地区各处“语少正音，书多俗字”，“随俗杜撰，不可胜计，士子行文，亦多怪体”的历史根源。

(《北海日报》1989年8月18日)

“一铺路”有多远

“一铺路”或“一塘路”，是本地人对一个里程单位即十华里(相当于五公里)的俗称(两广大部分地方只叫塘而不叫铺)。为什么这样叫呢？

《金史》载：“泰和六年(1206年)初置急递铺，腰铃传递(公文)”。铺就是金朝创设的邮递站，跟以前的驿站一样。《西游记》里也有“铺兵”(邮递专差)鸣锣传送文书的叙述。

究竟相距多远才设一铺?顾炎武《日知录》有答案：“今时(明末)十里一铺设卒以递公文。”这便是“一铺路”为十华里的根据。

“塘”，本是清朝军事驻地的专名。千总、把总的驻地叫“汛”，每汛之下又设若干个塘。塘根据军事和地形需要而设置，故塘与塘之间距离有超过、也有不足十里的。所以还是以铺为十华里的叫法为正确。

(《北海日报》1987年6月23日)

“至大芭蕉叶”的出处

“至大芭蕉叶”是北海流行的一句赌气话，即“拚丢饭碗不干”的意思。此话渊源于二百多年前的广东东莞：清朝乾隆年间，东莞人把仆人叫做“蕉叶”。是因为当时当地有个官绅人家，雇请一名俊雅而直率的仆人。主人待客，他常侍身边，应对文雅，礼仪得体，甚得主人钟爱。但有个老毛病，就是在主客谈话时，只要他高兴，往往不顾尊卑名分而僭越插嘴。屡经主人训诫，仍是不改。一天，主客争论的话题是植物叶子大小之最。有说最小是桔叶；有说最大是荷叶……此仆实在按捺不住了，竟当主人和众客面前高声说：“别说居停把我撵走，这是宰了我，我也要讲几句啊！”于是旁若无人地滔滔不绝：“诸公想都读过《南方草木状》吧？其中不是说‘蕉叶长一二尺或七八尺’吗？然则蕉叶至大，其无伦矣。”众客无不叹服。而今把“至大芭蕉叶”作为“不怕丢饭碗”的代词，实源于此。见《两般秋雨庵随笔》。

(《北海日报》1985年12月10日)

“戴绿帽”释义

通常说妻子有外遇的丈夫或妓院的男执事为“戴绿帽”，清朝以前则称“戴绿头巾”，其源甚古。考《诗经》“绿衣黄裳”一句注为：“黄为正色，绿为间色。以间色为衣，以正色为裳，是尊卑反置。故绿色为卑贱之色”。唐朝制度以绿色为罪人之衣，则绿色又成了耻辱的象征。元朝典章最为苛严，凡当妓女的家庭中的男子，限定要“裹青头巾”，违反的治罪。明朝制度，罪人和官妓皆隶乐籍，累代不得改业，乐人一律要戴“绿头巾”。清朝改制，头巾已被帽子代替，但绿

色仍属贱辱卑下的象征。故“戴绿帽”一语便随时俗而兴。

(《北海日报》1986年1月7日)

桂林官话在北海

清朝至民国初年，北海、合浦人大都能讲能听桂林官话，是因为官府规定，官话作为读书、教书和官场交际的标准用语，不懂官话就等于聋哑人，士子不能应考科举，不能当官办事，商贾无法做买卖，以至九流三教、贩夫走卒，无不把学会官话作为糊口的起码技能，作为家庭内助的妇女，也有相当部分“解官话”的呢。可见此种官话在当时社会的普及。

清朝官府作此规定并非无故。因为两广属“百越”民族地区，上古时代，散居此方的土著民族、部落相当的多，方言土语十分复杂，竟至一个村寨同时流行几种土语，这种地域条件造成的“语少正音，书多俗字”的特殊现象至今仍然沿袭保存下来。如果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中原“正音”的标准用语，外省人在此地生活多有不便。更主要的是因为明、清官制，地方官必须由外籍人当，“一朝君子一朝臣”，一位府、县官来上任，必然“引进”一班“自己人”，上至同知、县丞，下至书吏、司库都非本地人；还有这班人的眷属呢。因此之故，官定官话为标准用语是势所必然了。不管如何，这种规定客观上有利于南北思想文化交流，是一个进步的措施。

官定用语的成文案卷已无法看到了，笔者是从亲历和一些零星资料作出上述定论的。在30年代以前，合浦的秀才、举人老爷们交际应酬都讲桂林官话俗叫“鸭矢正”（其义待考），北海的私塾老师开讲《四书》、《古文评注》、《唐诗三百首》都用官话。学生们朗诵唐诗、宋词也用官话。清光绪九年(1883)，吏部主事唐景崧奉旨往越南招抚刘永福助越抗法，途径北海，在他笔记中说：“廉州北海妇女解官话。”可为根据。

(《北海日报》1993年6月28日)

方言顺口溜

廉州话“晒”与“柴”同音；公馆捱话“太”与“大”同音；高州话“买”与“卖”同音；普通话“歪”与“坏”近音。北海人据此编顺口溜：“廉州无晒柴，公馆无太大，高州无买卖，老兄(北海人过去把说普通话的人叫‘老兄’)无歪坏”。同是一个韵脚，曲尽其趣。笔者当年公差所至，也遇到过因不同方言产

生的误会。乘阳江人的机帆船去溷洲，夜航风大浪高，船主老劝旅客：“快衰(睡)！”印证了“阳江佬买席——无衰(睡)罗来衰(睡)”的歇后语。

在天等县买香蕉，壮族老农要价是“一角钱一‘堆’”。当付钱准备拿走其中一堆时却被制止，原来“一堆”实是“一对(二条)”之误。

在海口一间低档旅店下榻，房间设备简陋得连张桌子都没有。向服务员要，她用手连连拍打床榻后走开。海南黎话，床榻与桌子均叫“台”。难怪这黎妹讨厌我啰嗦了。男女二人各乘单车对面相撞，女的被撞歪前胎，骂道：“你撞坏了我的‘胎’了！”男的揶揄说：“那我要赔二条命了?!”女的红着脸悻悻走了。原来北海人把车胎说成“车呔”，女的说“胎”虽正确，但不谐俗，故受揶揄。

于是我把上面顺口溜续了几句：“……阳江无睡衰，天等无对堆，海南无床台，北海无呔胎”。

(《北海晚报》1996年5月22日)

北海合浦方言中的黑话与暗语

晚清时期，会党如林，个中成员复杂，良莠兼收，孙中山闹革命，曾利用会党成员组织民军推翻了腐朽的清皇朝，是当时的历史背景所使然。北海合浦在当时是出名的“贼藪”(俗称藪为“斗”)，山有山寇，海有海贼，都是“三点会”的成员，亦有殷实良民被迫入伙的。其中绿林团伙专以打家劫舍，绑架勒索为事。为便于联络通气，故编造了一套黑话。这种“贼佬话”也渗融于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用语中，余韵绵历近一世纪而未泯。北海和合浦人至今仍不时使用而不自知。因偶然机会的触发，特介绍一、二以飨读者：

时间：1993年×月×日。

地点：廉州镇某饮食大排档。

食客甲、乙，均年过花甲的殷实农民，操廉州话。

甲：“今日，‘趁闹卖扁嘴’不得价。买了一件‘纸扎’，已无求头搬沙头’了，请借点‘水’给我，回到‘青林’即还。”

乙：“我带‘水’亦不多，还要买‘十戥和香，四戥粉球，一只棉花包’做清明呢，对不起。”

甲、乙离座，皆有醉意。临行，甲关照乙：“记得拿‘二天’啊。”

你听懂了吗？翻译如下：

甲：今日趁圩卖鸭子不得价。买了一件衣服，已不够钱买米了，请借点钱给我，回到乡下即还你。

乙：我带钱亦不多，还要买十斤烧酒，四斤猪肉，一只鹅做清明呢，实在对不起。

临行甲关照乙说：记得拿你的竹笠啊。

北海商场也惯常用这种黑话，如说黄金为“老黄”，白银为“老斌”，一万叫“一方”一千叫“一撇”，一百叫“一日”，付款叫“过水”或“磅水”，用假钱币骗兑真钱币叫“丢包”，赌番摊叫“梗心口”，吸鸦片叫“咬云”，嫖娼叫“玩耍”……限于篇幅不能备述。

另外，商场对数码的称谓也另有代词，但不属黑社会的“贼佬话”，完全出于商业机密的需要。如对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”称为“上字斗山轩光允整竹耳”。亦有称作“左捻川罗抓坡星眉湾月”的。不过北海只用第一种称法。

由此可见，不管是淳风或者陋俗，如果形成风气，普及社会，欲移风易俗，谈何容易。

(《北海建设报》1996年1月17日)

东坡改诗和“狗喽喽花”

传说苏轼见王安石的诗有“明月枝头叫，黄犬卧花心”这两句，以为不通：明月怎会叫？花心怎容得黄犬卧？便把它改为“明月枝头挂，黄犬卧花阴”。因为这样才说得过去。王安石满肚是气，所以特地把他贬到海南岛和廉州来（按苏轼贬海南，后来量移廉州，根本与王安石无关）。东坡南下后，看见海南有一种见月则鸣，故名“明月”的野鸟；廉州有种蕊中有虫似黄犬的野花。于是，他后悔当日改错了诗。

廉州确有这种“黄犬”花，俗名“狗喽喽花”，草本植物，春夏间开花如指头大，色紫或黄，瓣细如绒，花蕊黄色。小孩戏摘之，对口对花心大呼“喽喽”，则有小虫自花蕊出，如小狗状，故花名“狗喽喽”。用叫狗的声音来作花名，这是廉州方言的特殊现象，怪不得连苏东坡这样的大学士，也大惑不解了。

(《北海日报》1985年5月25日)

“风报”一词的由来

1987年农历五月初六中午，我市突然来了一阵急风猛雨，顿时飞沙走石，如

万马奔腾而过。有人惊呼：“风报来了！”

“风报”，是北海合浦地方方言，指的是没有一定规律、突如其来、片刻即过的迅猛风雨。这是本地人称这种气候现象的“专词”。不了解出处原委的人，通常写作“风暴”。实非。

风报，本属飓风。清代吴震方著《岭南杂记》引季麒光的《台风说》中提到，南海中自正月初四日起至年终，共有18场“飓(风)”，每飓各有专名。如正月初四起的风叫“接神飓，俗名‘报’，五月初五日(是)屈原飓”。风报的特征是“无常期且急于台(风)”，与事前有迹象可测，来势由缓慢而渐增大，且为时“少则昼夜，多则三日”的台风有别。无怪本地渔人流传“台风如大贼(事先有警)，风报如小偷(来时无踪)”谚语了。今则把飓风和台风并称，而风报却成为上述现象的专称了。

照《岭南杂记》的说法，农历五月初六在我市出现的大风报，称之为“屈原报”或“龙舟报”亦无不可。因为节期气象·前后浮动一两天也算应验的。

(《北海日报》1987年6月9日)

北海端午旧童谣

小时候，最高兴的，除过年外，便是五月初五看龙船了。记得曾跟群儿传唱一首以“看龙船”作“兴”头的童谣，至今回味，觉得很有文学价值，特默写出来以飨读者：

车车转，浑浑转，阿妈背(音咿)我睇龙船。我无睇，睇鸡仔。鸡仔大，阿爸担去卖。卖得几文钱，买种撒落田。田头来帮勇，无准担屎桶；屎桶熏倒人，要罚三两银。阿爸银无有，牵去一条狗。狗仔吠“汪汪”，惊怕被人割，割了狗仔捉鸡仔。鸡仔被捉完，明年净心睇龙船。

考此童谣起源于辛亥革命前。那时，游勇横行，结伙冒充官兵，敲诈勒索，无恶不作，农民是直接受害者。于是便有“好事者”借儿童之口发出怨愤之声。

(《北海日报》1996年6月26日)

北海筵席十人一桌的起源

北海的喜庆酒宴，在抗战前原是8人方桌一席的，俗称“八仙台”。1946年以后才改为圆桌10人一席。这种惯例，原是由号称北海商场“四大天王”之一的荣昌泰老板吴颂南开“风气之先”。

吴颂南所以同另外三位被公认为商界四杰，确有他们的独到之处，除了“矢窟夹算盘”这种生意人共有的本能外(就是今天说的讲究经济效益)，他们还有想他人所不能想的本事。因此各人都有一二件佳话流传。

且说吴颂南长子已届婚娶之期。早为酒席如何开得合算大动脑筋。一天接到请柬，赴天海楼的包厅宴饮，主客恰是10人，酒楼老板李大有特设圆席安排，这在当时是个例外。吴受到启发：娶媳喜宴能否改为10人一席呢？难题是市面出租的桌面都是方桌，向酒楼租用圆席又不够用且不合算。最后想通了：马上投资置办了20席圆桌台凳和配套所用餐具炊具备用。吴老娶媳喜酒10人一桌开得别开生面，客人虽有微词，反而为他作了宣传。礼金赚了20%不在算，主要的是别人都竞相仿效。他这套台凳餐具出租却大行其道，一举两得。北海酒席10人一桌的惯例就此形成。笔者与吴生前有私交，故得其祥。

(《北海日报》1988年2月2日)

席上不闻觥筹声

菜肴分尽人自散

地角妇女吃喜酒有一种惯例：就坐人齐，便不由分说把菜肴统统夹到各自碗中，然后打包拿走即散席。以往如此，现今也不变，不同的是，过去包装材料限于芭蕉叶、芋叶、手帕、报纸等，剩下不能包走的菜汁、汤水，大家便送饭分享；有说有笑，尚有点宴乐气氛；而今有塑料食品袋，连菜汁汤水都能包装，故“包干”务净，散席迅速。陌生的外客对这现象，很少有不瞠目结舌，无以举筷的。

这种惯例，说是美俗未尝不可。据说最初是由包点菜肴回家给老人和孩子分尝而起，这种尊老爱幼的美德无可厚非。说是陋俗亦不无道理，因为10双筷子一齐交错飞舞，“10大碗”顷刻而尽，风卷残云，实有失斯文。但习惯成自然，要扭转也难。所以主家只能顺应并予方便，故女客宴席，一律分发食品袋，方便“包干”，这也算是物质文明条件下的新俗吧。

但值得补充说明的是，地角男子汉则属例外，他们浅斟慢酌，细嚼慢咽，尽享筵庆之乐，对女人的做法，一致否定。男女异俗，也算本地特色。

(《北海晚报》)1996年12月24日)

死人身上为何放把刀

北海丧俗：死人装敛上篋未进棺材前，尸身上放把大刀镇住。许多人都说不

出所以然。

据我母亲说，是为了防止打雷或猫跳过尸身，发生死尸“坐起”的现象，这种尸变，一则把家人吓坏，二则不利于死者“往生”云云。又据她说青年时，大西街有某丧家停尸未敛，有家猫跃过尸身，尸体震动，簧床作响，吓得守灵子女四散一空。后来请巫师画符喃咒以厌胜，花了好些钱财。

关于尸变，《聊斋志异》和许多旧小说都有描述，使人毛骨耸然。这是小说家裨官之言，不必当真。说到北海丧俗用刀镇尸的做法，或许有某些科学道理？科技杂志介绍，尸体在某种特定条件下会有生物电的感应而偶然出现震动(如说死尸坐起绝不可能，尸身关节僵硬，岂有坐起之理)。用铁器压尸身是否起到中和生物电的作用呢？当然在普及了火葬的今天，大可不必有此一举了。

(《北海晚报》1996年7月23日)

地角人的“花名”传统

到地角寻亲访友，如说不出被访人的“花名”(即绰号)，得到的答复多半只是摇头。

“地角人只有花名”的习俗莫明起始，但这种“花名”传统的妙谛很值得回味。“花名”能针对不同性格、气质、偏好、外表、生理、经历、技能等特征而定，用词鄙俚，但准确、凝炼、含蓄而蕴藉，可说是廉州山歌的派生，妙趣横生，令人一笑之余仍堪咀嚼。

两个酒量极大的人，分别叫“无底瓮”、“痞沙头”(痞——松而不实)；有个做了好事反被贬低的人叫“垫脚石”；有个水性极好的叫“水犒留”；有个排行第三而懒惰成性的叫“水蛇三”；一个沉迷赌博的叫“糜烂牌”；有个名声不好又无所作为的叫“烂尿煲”；有个能言善辩的叫“审死官”；跛子阿晚叫“跛跳(读挑)晚”；麻子阿养叫“花面养”；有个专占便宜人叫“鹰不企”；其它如“开口螺”、“蚝蛎壳”、“断头虾”、“无螃(读孔)蟹”……不一而足。至于妇女的花名，类多不雅，从略。有个地角人大言不惭说：“全村人人有花名；独我‘沤烂板’没有。”因之笑柄广传。地角花名传统至今不衰，且代有出新。

(《北海晚报》1996年9月3日)

新年漫话舞貔貅

过去，北海民间在新年的喜庆日子里，喜欢搞“舞貔貅”的活动来庆闹。在

锣鼓和爆竹声中，只见两大汉舞着一只怪物冲出来，一人双手举着怪物的头，一人执着那怪物的尾，随着人的舞动，那怪物眨眼、顿首、张口、摇耳，跳跃、滚地……十分威武。这怪物便是貔貅，它的“长相”奇得很：眼如铜铃，血盘大口，狮子鼻，葵扇耳，还在头顶上长出一条翘角，令人望而生畏。

人们为什么要舞这奇异的独角兽？说来是很有意思的。原来，上古时，各部族都有自己图腾，图腾一般选择一些人们认为最有威慑力的猛兽来充当，如狮、虎、豹等。打仗时把图腾抬出去，目的想吓倒对方，在心理上占优势。开始，这些猛兽图腾是很有威吓作用的，但随著人类的进步，常见的猛兽便不可怕了，于是有的部族就根据想象另外创造出一些怪异的动物来作图腾，貔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。它在狮、虎、犀牛等外形的基础上加以夸张，“青出于蓝胜于蓝”，确实比一般的猛兽显得勇猛得多，可怕得多。春秋时的古籍《礼记·典礼上》就说得很清楚，行军时，“前有挚兽，则载貔貅。”可见它是当时军中必备的崇拜物。怪不得后来把勇敢的军士也比作貔貅了。

社会进步了，自然界什么也吓不倒人类了，于是，图腾的意义便转化，由实用性变为娱乐性，比如古代只能绣在战旗上的龙，现在居然也能绣在被面上了。舞貔貅的风俗也是由军旅图腾演变来的，人类有枪炮了，举起一只怪兽吓不退敌人了，但在这个民族的心里，永远不忘曾经帮助过他们取胜的图腾。人们用各种方式纪念这段历史。试想一下，在惊心动魄的锣鼓声中，在欢腾跳跃的貔貅身上，你难道不体验到古人那种胜利的喜悦吗！

（《北海日报》1987年1月29日）

元宵“偷青”与“上灯”

元宵节是继春节之后的传统大节日之一。合浦地方叫“小年”。过去过“小年”，最富地方特色的风俗要算是“偷青”和“上灯”了。

“偷青”是在元宵节黄昏前开始的。为了在元宵节中得“采头”，当天下午，城镇的居民们，个个艳装打扮，或密约情侣，或携儿带女，成群结队地到郊外偷拔农家菜圃中的蔬菜。他们根据自己的愿望来采拔不同品种，如想生财则拔生菜，想勤恳就拔芹菜，拔生葱是想聪明。姑娘们多采菜头（萝卜），密意在于嫁个称心夫婿，故以“采头”为吉兆。对此种约定俗成的“偷青”，菜农们只得用提早收获蔬菜或者往菜上洒淋粪水来对待。不然，丰茂的园圃畦陇，转眼便成邱垸。

“上灯”本是元宵灯会的美俗，封建统治者以这天晚上作为与民同乐，粉饰太平的活动，金吾不禁，火树银花，花灯花市，人山人海，好不热闹。而痴男怨女的幽会密约，更视此夜为千金一刻的佳辰。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”是古代元宵的写照。但合浦过去元宵“上灯”却是另一回事。所谓“上灯”，就是谁家若在旧年生了男孩(生女则否)，新年元宵便要挂上一对花灯，并开“灯酒”请客庆祝。灯是从市场买来的，用芦茎结扎。外糊彩带，形制一如宫灯，把它挂在祖宗神祇的厅堂之上，然后大排筵席，庆祝添丁，以求吉莉。

(《北海日报》1987年2月12日)

怎样贴准门联

春节，我国民间有贴门联的风俗。贴门联不单能表现人们美好的愿望，而且体现了人们的文化素养，决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。但常发现有人把门联贴反了，这是有碍观瞻的。怎样才能把门联贴得准呢？

首先要把上联(对头)和下联(对尾)分别贴在那边的问题搞清楚。按中国人的传统观念，上联便应贴左，下联贴右。左右的定位是这样：你站在门内，面向门外。左边贴上联，右边贴下联。

其次是分辨上下联。上联末字通常是仄声字(极少平声字的)，下联末字是平声字，这样读起来才顺口。掌握分别平仄的知识，一看对联的尾字便能分出上联或下联来了。分辨平仄方法很简单，若以广州话音为标准，字音拉长而不变音的是平声，如“东”、“江”、“支”等字；字音不能拉长。纵能勉强拉长，尾音必然变调的，如“董”、“讲”、“纸”等字，属于仄声。余可类推。

斟酌联语也可分辨上下联。拟对跟写文章诗词一样，语意都有主与从和起与承的规律。例如“国安家庆；人寿年丰”一联，分析联语，只有在国家安定团结这种政治局面的前提下，才能谈得上人民健康和发展经济。这样就不难辨别上联和下联来。“男女平等；婚姻自由”语意主从起承关系何等明显，因为如果没有新中国的男女地位平等之因，是决不能产生自由婚姻之果的。如果把这些意思弄清了，就不会因果倒置，主从颠混了。

(《北海日报》1987年1月27日)

“送灶神”与“守门神”

合浦地方旧俗：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晚，家家户户均备酒茶果品和草料等物，

焚香烛和“秦疏”一纸，向供奉在厨房里的“灶神”（又称灶君）祈求福佑。这种活动，谓之“送灶君”。据说十二月二十四日，是灶神一年一度上天奏报人间善恶的日子，故在前夕向灶神礼拜烧“疏”以求庇护，祭品中的草料，是为送灶神上天的“神马”准备的。“灶神”是什么样的，诸说不一。《淮南子》说，黄帝作灶，死为灶神，把灶神说成是民族祖先的化身；《酉阳杂俎》说“灶神名隗，状如美女”；道教则称它为“东厨司命。”真是莫衷一是。追究起来祀灶神的风俗由来已久，并且不只合浦一地。唐朝罗隐和宋朝范成大分别有《送灶神》诗：“一盞清茶一缕烟，灶君皇帝上青天。”“古传腊月二十四，灶君朝天欲言事”，可证渊源的久远。民以食为天，吃饭问题最重要，这大概是古人之所以在过年时最先奉敬灶君的原因。在日趋文明的今天，盘飧美食无需祈求神明赐予，故此种旧俗早成过去。

“看门神”则是过去合浦地方独有的风俗。原来在元宵晚上豪门富户所贴的门神，眼睛往往被人剜去，为防止这种视为不祥事件发生，大户人家都派人通宵看守门神。后来形成了风俗。考究起来最初搞恶作剧的应是一些对豪门怀有恶感的穷人，后来则形成习惯，指导思想是希望分享有钱人的富贵吉祥，并非都抱恶意。此种无稽举动，辛亥革命后已不再发生了。

（《北海日报》1987年1月27日）

北海端午旧俗

传统的端午节，因五月“单五”日的谐音而名。北海端午旧俗丰富多彩，是受珠江三角洲和中原地区直接或间接的影响。

龙舟竞赛的传统节目，渔民是最早的主办者，他们笃信一年一度“扒龙船”，会使海步平安，渔业丰收。光绪初年，广府商人取代了渔民赛龙舟的主办席位。广东人写的《北海杂录》说“埠上惟广商敛资置一龙舟，届节则铺张旗伞，绕游河内。此外渔人舟子，各以小艇竞渡为乐。”所指龙舟，实为后来俗称“花艇”的前身，而“渔人舟子”的“小艇”才是竞渡的龙舟。到了宣统年间，北海商会成立，赛龙舟和游花艇活动，转由商会操办。1938年以后，民众剧社接替主办。这种活动，虽在直接受日寇战舰飞机威胁的抗战时期仍未曾中断，经“三三事变”浩劫的1941年，照旧有三艘龙舟下水。建国初期10年中，赛龙舟都由各个渔业社组织，市体委接手以后，这种活动便不经常。文革以后，连续中断了10多年，

“扒龙船”仅成为北海人的美好回忆了。

游花艇活动原由广商引进。清人写的《珠江竹枝词》：“蝉鸣柳绿荔支红，画舫游人不约同。”画舫便是《北海杂录》说的“铺张旗伞”的花艇。北海花艇用8只驳艇骈连，上铺木板，树以木柱，张以幢幔，张灯结彩，艇上置酒唱曲，从游泳场到外沙来回“游河”，通宵达旦，鼓乐喧阗，与龙舟竞渡同是水乡升平景象的盛举。游花艇组织难度较大，故不经常，抗战后的1947年仅有一次。

粽子是应节的食品，民间作为礼物。传统的粽子须用红绳裹扎。人们还用雄黄调酒而饮并涂小儿面额；用香茅煲水洗身，谓之“沐兰汤”，以辟邪气；门悬香茅艾叶，以禳不祥。

端午日北京旧称“女儿节”，无怪北海妇女们在当日的节目够多了：节前用五色丝线编织成各种形状的小袋，装入臭丸樟脑，妇女和儿童人佩一个，意在辟秽避恶，却成为互相攀比手艺高下的时令工艺品；又采凤仙花叶和矾捣汁来染指甲，鲜红历久不褪；摘石榴花插头……等等。意为辟邪避瘟，实为时尚装饰。清人《帝京岁时记》：“榴花似火，家人摘以簪头；凤草飞红，绣女敲而染指。”故知本地风俗与京穗渊源不浅。

(《北海日报》1988年6月14日)

北海“鬼节”古今谈

农历七月十四日，北海市城乡的寻常百姓家，都例行过“鬼节”。

“鬼节”取义于梵语“盂兰”一词：即解放众生倒悬厄苦之意。据说古有目连之母死入地狱不得食，成为饿鬼，佛在七月中元用“盂兰盆”救她苦难，并诵经施食，这是盂兰节民俗的起源。《荆楚岁时纪》称为“盂兰盆会”，故知此俗起源于佛教传入中国的公元58年至75年之间的华中地区。

北海人过“鬼节”，无非围绕施阴济阳做文章。

当日，家家杀鸭(这是必备的主品)杀鸡，保持完只，与猪肉整块同锅汤熟，平列摆放木托子之上，谓之“三牲”。有钱人家还加一鹅一鸡凑成“五牲”。配以一盘方块形的米糕，俗称“桥板”的；还有必备的茶、酒米饭，才成为完整的“牲头”。点燃香烛，供奉于厅事中的祖先牌位之前，先由齿尊的家长(一般多为老妪当此主祭角色)领头，跪拜中唠唠叨叨，不外祈求家神祖先领祭，庇佑合家平安发财之意，以次按尊卑辈份先后跪拜，毕，焚烧预制的纸衣、纸鞋(市上应节商

品之一)冥镪。家祭仪式结束。随之，把牲品切碎碗盛作奇数，朝门外拜祭焚烧冥镪纸衣鞋如仪，还烧爆竹一封。长短丰俭随意，谓之“荫门烧纸”，这是专门为本家以外，但有姻亲关系的“外鬼”而设的。这种仪式，多在中午时分完毕。

晚餐，合家团聚，共享祭余，高高兴兴地过节。除了家庭成员，一般不请客。懂事的也不登门作客。这种活动，与内陆地区无甚差别。北海的“昼家”（渔家）亦甚重视。出海作业的都尽可能返棹回家过节。但是，节日祭品中的“桥板餛”则是北海的地方的特色。是用米粉黄糖为料，用特制的木模子压成长3寸，宽1寸的小方块，有各种精美的图纹，炊熟即成，是为应节的商品。据说是为了方便被幽囚的“地狱饿鬼”搭桥渡奈河来阳间享祭领施之用。此俗解放后已省，故而今已无此应节商品供应了。

此外，晚上还有“施幽”活动。即向幽灵饿鬼施舍之意。

当朗月初上之时，家家户户必备一副小牲品——通常是一个煮熟的螃蟹、一个鸭蛋、一尾鱼，还有三碗米饭、酒三杯、茶五杯，摆放托盆之上，点燃香烛，在大门之外，向游魂饿鬼施祭，烧冥镪衣鞋如仪。然后将牲品米饭统统送来前来守候的乞丐、孤儿等人。最后将绿豆芽或葛茹切丝往门外遍撒，“施幽”结束，即紧闭大门就寝。而今沿守此俗的已不多了。

解放前富商豪门，“施幽”亦是显示气派的活动。牲品丰厚，而且还撒铜钱钞票，视乞丐孤儿们抢夺牲品钱钞为乐，名为“拖幽”，实为“济阳”。不管如何，在旧社会使无家可归的可怜人难得一饱机会，亦算一种美德吧。

亦有于当晚做水陆道场和焰口等大型活动的。这种情况，并不多见，解放后已彻底革除了。

(《北海乡情报》1993年9月8日)

广州话琐谈

新抱、塞孙

广州话称媳妇为“新抱”，或说是“薪臼”的转音。旧社会，新妇入门后三朝便进厨房“洗手作羹汤”，所以操井臼薪火的家务劳动，是当媳妇的本分。故云薪臼不无道理。

塞孙，即曾孙。《广东新语》说广州称曾孙为“塞”。塞者息也，是小之谓；息亦通塞，一说滋息；一说充满。因为至曾孙一代，家庭生齿已相当繁衍，人口

充塞门户了，粤西区亦同此称谓。

扌若、扌耘、扌亟

扌若yug¹，动也，《篇海》作呢角切，通指人与物的主动或被动。例如广州话说不得动手动脚是“唔准扌若手扌若脚。”说风吹树木动摇是“风吹的树林都扌若晒。”粤西区同。

扌耘wen²。《唐韵》作云粉切。《说文》释为“有所失也”。广州话谓寻找，本此而意有所伸。粤西区同。

扌亟gigl。《广韵》作纪律切。《说文》释为“疾也，从心亟声。”一曰慎重貌。粤语本第一义意伸为伤心、哀毁、愁怵。如说伤心之极为“真扌亟死人！”粤西区同。

粤语多唐宋古音

粤语保持许多唐宋古音的事实，在写作旧体诗词和编写粤曲唱词的实践中有直接体会，而且早为世所公认的汉语声韵学权威王力先生在理论上作了肯定。他在征引晚近诸家学说时说：“相信上古的(声)调类有四个，因为现代中国各地方言都保存着四声的痕迹。”他还举例：“吴语平上去入各为二。”即四声各分阴阳，共八声。而“广州(语)平上去各分为二，唯入声分化为三”。即平上去各分阴阳二声，入声则分阴、阳、中三声共为九声。可见广州话比苏杭的“吴侬软语”声调为广，王力先生还论证广州话系统的声调说，与“古代的声调系统大致相当。”(《汉语声韵学》>>453、565页)。他所指的“古代”，自注“包括上中古而言”。所以王力先生说写作传统诗词，最易分辨平仄的，当属闽南(客家)话与广州话。因为它还保持入声，而北京话早已没有入声了。当然，写格律诗只要掌握平仄，填词掌握平仄及其阴阳就够了，但撰粤曲唱词非要掌握九声不可，否则曲艺演员就因行话所说的“顶字”唱不下去。我们还注意到，用北京话朗诵诗词，因为把入声读作平声，对于音乐性很强的古曲诗词，就比不上用粤音(广州话与闽南话)表达得准确。以李煜《浪淘沙》为例：

“帘外雨潺潺(阳平韵)，春意阑珊(阴平韵)。罗襟不耐五更寒(阳平韵)。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贪欢(阴平韵)。独自莫凭阑(阳平韵)！无限江山(阴平韵)，别时容易见时难(阳平韵)。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(阴平韵)。”

这首词非常讲究用韵的阴阳交替相间，用粤语朗诵，则低昂抑扬顿挫声调美

可以完美表达，如用北京音读，效果似逊一筹。

粤语还有许多有声无字的词语，可以说是古音的“痕迹”和遗韵吧！

(《羊城今古》1994年第四期)